

中国商务巨子(五)

董原 主编



目 录

唐星海和“保丰”、“庆丰”	1
黄楚九和“上海大世界”	60
杨粲三和四川聚兴诚银行	119

唐星海和“保丰”、“庆丰”

唐星海，江苏无锡人，生于本世纪初，一九四八年迁往香港并定居。他所经营的上海“保丰”、无锡“庆丰”两纺织厂，抗战胜利后的头两年，已名满江南，资产已有几十亿法币，当时无明确核算，当为十二万美元。

以新取胜获得祖传根基唐氏是无锡大姓，可谓名门望族，“门”，得清末无锡东北隅之首，又“进士及第”，且为一门双进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时；“族”，不仅人丁兴旺，如今已不下数百口，分居国内外，而多有声名显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无锡严家桥并开办布庄起步发达的景溪公唐懋勋为无锡唐家的第一代，则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辈“千”字辈，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内外：国外的三十六“千”无不居于要津：多为企业家、金融家，余为专家、教授；国内的二十八“千”，亦多为著名的工程师或专家学者。六十四“千”中，如今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并正在做着积极贡献的唐翔千尤为显要。唐翔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后留学美国，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并取得了伊利诺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现为香港知名的实业家与纺织专家。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与中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九七四年以后，又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向祖国大陆投资，已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就已近二十家。现已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无锡唐氏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些“色彩”一代较一代辉煌、斑斓，尽管不断地遇到艰难、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发达、强盛，是完全符合进化论的。在旧中国时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谓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张与不惜智力投资的巨大花费，得以造就了“千”字辈中的许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启作用，也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父亲并不是唐的“长支”，他本人也不是他这一辈的“嫡长”，但却承继了唐门之业，并予以发扬光大，将在国内的祖业推向顶峰，靠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撷众长的特点。为了明确说明此点，对上几代的有关情况，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荡到无锡扎下根明朝自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便濒遭倭寇侵扰，初以浙、闽最凶，后波及江苏、山东，虽有许多抗倭名将与义士、盐民奋力抵抗，其势稍减，怎奈明自万历以来便愈加腐朽，再经天启间魏忠贤专权，明争暗斗，怨声载道，崇祯中又“天下大乱”，倭势复炽，唐氏的祖先原本该是古淮扬府人氏，当游居常州武进时，适逢倭患正凶，只好举家随众逃难，仓惶间，唯沿大运河南下，待至无锡倭患已息，又听人说“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今已无锡自然宁静。惠山、锡山、大运河造就了无锡无限风光，赋予无锡高雅神韵，便决心在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并选定了双河庄。

幸无倭患，又经几代的渗淡经营，渐渐有了家底儿，便在住家东南方不远处的北塘办起了只有三间门面的布庄，为求吉利，取名“恒升”，这就是唐家的经商之始，

也是后来大型纺织业的些微基础，也是自景溪唐公兴办的基业之根。时间大约在清咸丰末、同治初，即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热情真诚待客，敬顾客如上宾是他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得以发达的根本原因，并以一凤洒大贾的！

临别赠言，改了字号。那大贾鼓励他要时常如此待客，一再强调“时常”，他就索性将“恒升”布庄改为“唐时常布庄”，也果“时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兴旺发达，到了 1860 年前，传来了“长毛要攻打无锡”的消息，为避兵灾，唐家又迁至无锡东北的严家桥，距城近六十里，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虽说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一个小汉上，小桥流水人家，长烟垂柳物华，可在当时既僻处一隅，又无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个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为显。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经营，他和儿子虽不及他六弟与侄，可他的孙子君远，重孙翔千（即前文所说的唐翔千）却将其祖业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谓轰轰烈烈，大光门楣。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扬了祖业。景溪唐公创的家业虽大：置地六千余亩，旧业布庄“春源”之外，又开办了“德仁兴”茧行、“同兴”木行，建了唐氏仓厅，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后，就各自中平了。

花开八朵单表一枝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为：浩镇，字郭郑；滋镇，字保谦；济镇，字若川；（四子阙名，早夭）；漾镇，字申伯；泳镇，字纪云。孙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个个喜欢，景溪公独独更宠爱六房的次子保谦，临终日还特地将其叫至榻前，参与诀别，也正是为此，使他的这个爱孙弃仕经商的。

滋镇保谦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读书时，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实行科举，虽说“洋务运动”此时已然兴起并已渐抬头，然而：

“商非正途”、“正途唯科举”的旧观念仍是大占上风。梓良公家道殷实，决意“投资”于儿子的做官上，遂将长、次、三各差两岁的三个儿子几乎是同时送进了家塾。三个儿子读得都不错，特别是长子。后来发现三子反而较次子更好，当父亲的未免有些着急，因为这个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钟爱，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称其为大富大贵，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么行？可打骂又非唐家家训的手段，梓良公就反复诱导，自免不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苦读圣贤书，善理天下事”之类。可是这个二公子却总是不及乃兄乃弟！算术、算盘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数的。因此，哥哥郭郑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转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缓期应考，直到哥哥、弟弟于癸巳（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两科，乡试中金榜题名，中了举。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得到“进士”名分“正途”为官的资格，而且已可直接经“选举”或自捐为官，甚至直接为知县。因此都被称为“老爷”，自然甚得人恭维，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讥称之为“夹板老爷”（夹在两兄弟之间）！如今还是个“白丁”，处境十分尴尬，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而目下时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所谓挡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他对祖父也敬重

如神，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故而更加重视，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遗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孙为官，“学习一业”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学习一业”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不是不从祖父的第一遗训，而是如今“读书中举”已大不如前，中举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做官，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学习一业。倘要做官，经商后一样可捐，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何必必走“中举”一途？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舆论视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商人可以捐官了。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训的“理论根据”与眼下的“事实根据”，说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学习一业”的，也果甚为争气——说句闲话，人的素质不同，又所谓人各有志，别人，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说因材施教，“兴趣教学”

是很重要的——他本来喜欢数学，喜欢易物生财，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真是如鱼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砺成器的苦心，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而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并一再嘱托那老板“严

加管束，多多教诲”。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须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满了师，而且学得精，帐目记得清晰精当，算盘打得行云流水，谁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将他的产业支柱“春源”布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学徒”，他也确实时时以“学徒”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东家”与职、雇员间的界限，而且不顾奔波劳苦，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大江南北，运河东西，深入各种产棉区考察，认真选购，不断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如顾什舟、张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开阔眼界，觉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闯世界”，梓良公也只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荡成性”的遗训的，力求自立。

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一是从报上看到，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纺织业因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关，且“衣居于首义”，而当时国内的纺纱厂，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他就决定办个纱厂。可他只有两千大洋！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小，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银洋的基金。他经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蔡名文鑫，字緘三，曾与他同赴过乡试，也同落在

孙山后，秋闱期间相处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颇精明，家道也较殷实，他就登门造访，详陈办店方略，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当即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〇二年，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为“永源生”的米行，经营粮食，并承办起了皇粮。由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时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誉，斗满升平，（秤）抬头走路，开张不久，就后来居上，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生意最为兴隆，很快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又办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个很吉祥的名字：

“九丰”，于一九〇九年，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谦的长兄郭郑先生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久别后手足相逢，家人团聚，自是分外亲热。然而，对唐保谦来说，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一是日本经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二是郭郑先生算了一笔帐，莫说历次对外赔款，仅庚子赔款一项，就可以兴办七万五千六百多个“九丰”面粉厂。当时中国人尚止四亿左右，就是说莫说青壮年，连每万个老弱妇孺都得拿出近两个“九丰”面粉厂的代价！还有那么多的赔款呢，哪止一个“庚子”！这不但使唐保谦与子侄们一样愤愤不已，也更令他明确与坚定了好经营，以实业救国的决心。于是，他就专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几度引诱下，仍洁身自好，一意于经营，终于给他学会了不少经营之道，并悟出了不少经营要诀，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名为“申庄”的驻在机构，

选人做为“九丰”

的代表，为“九丰”搜集情况，宣传推销“九丰”的面粉。回无锡后，深得蔡缄三的赞同（此时他们已成了儿女亲家），并以此类推，在无锡又设了几个庄点，并设立了九丰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与搜集、研究市场情况，并动员职工们吃本厂面粉，以便收集对面粉质量的意见，及时有效地对质量做相应的改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买卖越做越活，越兴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不但民族企业得以发展，各交战国面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丰”由于及时获得了这一信息，动手早，抓紧于价格猛涨时大量销售，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自然使“九丰”得以迅速的发展，新建与扩大了埠栈。在广泛听取职员的建设性意见后，利用了大量麸皮零售，并吸收游资办了钱庄。唐保谦于“九丰”兴旺中也相机办了些自己独资的买卖，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着手实施他的宿愿：办纱厂。

办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资金，办纱厂则需要上百万元。此时虽说唐保谦已有了大规模的资金积累，远非当年的两千大洋可比，可终究还远远地拿不出这个大数目，于是他就与亲家蔡缄三仔细商讨，进行集股办厂，可这得要请个有财力、有威望、有见识、有度量的人出面操办才行，于是他们商讨来商讨去，选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较唐门更为显赫，官高爵显，根深蒂固而又财大气粗，不仅在当地，就是在整个江南也是声名显赫的。薛南溟的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钦命”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衔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归国述职途中，病死于上海。

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举，不久入李鸿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忧”辞官，不久，即办起了茧厂，而且越办越大，所经营的“金双鹿”牌生丝享誉国内外，并获一九二一年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与蔡缙三很有交情。

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特请阿炳的师傅华道士鸣弦助兴，恭约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赏景，听胡琴。地雅、乐雅、人雅，雅兴盎然间，议妥了办厂大计，于是由薛南溟出头，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谦六弟唐纪云、长子唐肇农都各入了一股。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东会上，认真地研究了厂名，最后接受了唐保谦的提议，定为“庆丰”，并议决了几件有关大事，接着便买地，建厂，进设备，招收工人，紧张地忙了半年，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兴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试车开工。购有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一百五十台，斜纹织布机一百台及相应的成套设备，及英国 GEIOOKW 发电机一座。

雇佣一千余名工人。现已无法察知是什么原因，当年八月二十日（旧所）开工典礼正喜气洋洋进行中，车间里一位师傅喜冲冲乐孜孜地用铅桶装着献上两条活蹦乱跳尺许长的鲤鱼。说是开工后于加水时在水中发现的。自是喜庆非常，唐保谦更是端肃地整衣正冠，恭谨地向双鲤拜了三拜，并建议将庆丰的产品正牌定为“双鱼吉庆”，副牌名定为“牧童”，自此，这一商标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开工之日或大吉大庆之时，也必供上双鲤，认真地顶礼膜拜，其广告作用也果分外灵效。再加以唐保谦弹心竭力地大抓质量，极讲信誉，“双鲤”

大跳龙门，销路大开，门庭若市，致有一些纱号、布庄竟至或自动提价，或预先付款，一求索购。

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来，先是比唐保谦还小了两岁的亲家蔡絨三退居下来，不久，唐保谦见大局已定，也放心地将厂子交由六弟纪云与长子肇农管理，他想喘一口气了。可他这口气尚未喘匀，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长子肇农不幸于刚回厂接任没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沉重的打击，几乎使他难以自持，愈加心灰意冷，可工厂总不能放下，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晔如来位助六弟纪云管理厂子了。

景溪公决没料到他传下的布庄会在六房里发扬光大，植根无锡，打入上海变成规模不知扩大几许倍的大纱厂；梓良公也根本没预料到是他这个仕途最没出息曾被称为“夹板少爷”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门楣。倘景溪公地下有知，定然欣慰地自矜：

没白钟爱这个孙子，那遗训中的“学习一业”真是点石成金啊——更万万没有料到，更予以发扬光大的，又是六房二枝下一辈中的“老二”！

在唐星海眼里，那甚负盛名的“庆丰”不过是辆老牛破车唐保谦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长子肇农（名阙，当时俱以字行），次子炳源，字星海，三子晔华（名亦阙佚）。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辈，晔如与肇农的名中首字都应是火旁，尾字是“源”。三子之中，他最喜欢也最器重的是长子肇农。这个肇农，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又善交际，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即在无锡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被选为省议会的议员；幼子晔华虽说年幼，却也聪明，读书肯于上进，再加以人多半偏爱幼子，愈

老愈是舐犊情深，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唯独次子星海，老人家从其小便有些不放心的。人是很聪明也很出色的，相貌更为出众，在南人普遍偏矮中，唯他得天独厚，身材竟高达一米八〇以上，在当年国人身材较现今普遍为低的情况下，是个高得可观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也算个“大个儿”。又生得方面广颐，天庭饱满宽阔，地阁方圆劲挺，浓眉重目，直鼻阔口，是位风度翩翩又甚有仪威的佳公子。棱角分明，大刀阔斧，与乃父的眉目慈和、一团和气大相径庭，这也许正是老先生最不喜欢处。又加上幼时便依家族之议与样良公的决定已过继给早夭的四房若川为子。若川虽不及婚娶，总是一房，因而称保谦老先生为“伯”，人虽说仍留在他身边，教育、供养一由己任，可有了这个名分，在家训严森的旧族中，总觉得较长、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层。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桀骜不驯，已上了清华大学，居然还对“祖训”，不能背诵如流，虽然一经复述便记得甚清，可愈是如此，愈说明这小子没有把庄严的“祖训”真正放在心上。那不仅涉于“忤逆不孝”的嫌疑，而且必不会认真继承祖业，那还了得？这“祖训”

保谦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不仅是他所敬爱的祖父景溪公对子孙的遗嘱，而且也帮了他的大忙，更由他几十年的经商实践证明了是“至理名言”。有此种种，保谦老先生对这个“次子”也看得很“次”，至少远不如长、幼二子那么可靠。认为他“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自然“难堪大任”。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长子身上，冀其能很好地继承与发扬祖业。果然，不但年纪轻轻就在省里有了高位，且经商也甚得其法，官商两途都可弘扬唐家家风，有他照顾幼子也完全放心。殊不知这老先生忽略

了几个根本之点：一是，“祖训”是将做官（“中举”自是为做官）放在首位的，他不但不许儿子做官，甚至连长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议员也要其设法辞去，尽管是出于世情动乱，时官腐朽，可到底是从主要方面违了“祖训”。另外，他不也是“次子”，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时人视为“最差”的“夹板少爷”么？可人愈老愈偏执，对次子星海实在是越看越轻。然而，天公不做美，硬是夺去了他寄以厚望的长子，虽悲痛欲绝，可总得面对现实：幼子尚小，总不能让他负起重任，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再怎么说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纪云虽为手足，百年之后总不能将家业传给兄弟。于是，他便发出急电，召两个儿子回到“庆丰”理事。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上也显露了他的内心，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是要其立即弃学返锡，二儿子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一个“立即”，一个在“立即”前加个“学成”，就不但有了时间差，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幼子尚未读完大学，尚幼也要“立即”，次子不但已大学毕业，且去美国深造，却要“学成”。可见对幼子寄望尤为殷切，倘不是“幼”而尚未成材，只怕是只召晔如，不必星海了。而回来之后，又不似对长子般，列为一户股东，董事，与其叔纪云共管工厂，而是“协助为父及纪云叔工作”！——两个不顶一个！

唐炳源（星海）在清华结业前夕，曾有意恭问其父，准备让他做什么，保谦老先生告诫他说：

“你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珑，还要难得糊涂，你怎么做得来——日后不许你从政为官，只一心去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

于是于一九一九年，唐炳源（星海）便从清华大学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了。

他风度潇洒，又是舞场高手，网球健将，人又聪明好学，在异国学府里也是个好学生，而且进步很快，他首先选修的是纺织工业前纺工段的机械制造，因为他离家赴美时，老父已明确交待：要办纱厂，他必须学有这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识。他严遵父命刻苦学习。至于打球，无非是有了更利于学习的健身手段；跳舞，一方面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一方面也为了未来的交际方便。可以说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核心：学成学好，将来继承好祖业，当个全方位高超企业家。目的明确，动力足，便也对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那些什么清花机、钢丝车、并条机、粗纱机等等都倾注了兴趣和心血，以快速度获得了这方面的硕士学位，紧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纺织管理学的学习之中。此时从家信中得知庆丰纺织漂染厂已然投产，他更加紧了学习，并设身联想，似在课堂上便已置身于庆丰的管理之中了。仍是学得好，结业得早，又获得了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生的学位。

就在学位将到手之际，他收到老父由国内发来的急电，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这可是大事，一来这是他的家，二来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学成”之时，他就在获得学位证书后，当即加紧准备，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别了异国师友，乘船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一路上家庭、工厂、事业，他想了很多很多。

在美国，由于他的条件优越，曾屡蒙异国同学中女郎“黄”、“绿”之睐的含情秋波，更得留学同胞中异性不断地示以柔情蜜意，可他一来重于学习，二来也无足

以占据他心房的丽影，从未虑及婚事。却不料于归来之始，刚刚踏入国门时，竟遇上了高照的红驾。

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正是金秋烂漫。就在他父亲设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号庆丰上海办事处为欢迎他而举办的舞会上，他一眼就从华丽、摩登、争芳斗艳的如云美女中发现了一位令他耳热心跳、甚为倾心的大家闺秀。她似金秋般丰满，如春花般艳丽，夏荷般挺秀，冬梅般清丽脱俗，如画的眉目，饱含温情、丰腴的姣靥，流光泛采，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得体的举止，高雅出尘。他当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有礼貌而姿态优雅地邀其跳舞，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飘入了舞池。待问得这位小姐的芳名为温金美时，他似觉有耳闻；同样的，待他通上姓名之后，从温小姐莞尔一笑中也流露出“君名不虚”！后经朋友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堂兄曾专门向他提及此女：不仅才貌双全，风华绝代，而且门楣甚高：祖辈做过满清高官，海军大臣；其父温宗尧现在政府外交部门供职，其母也出身名门，与上海声名极为显赫的“查理宋”之妻是至亲的姨表姐妹，“查理宋”的长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员，三女宋美龄也嫁给蒋介石。即使此时，也已富倾天下了）。

天下之大，可求而不可遇、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是，唯两情巧合，珠光玉灿，相映成辉，方为神仙眷属。经人撮合，保谦也可谓得了“媒灼之言”，他又极中意于温家的富足（现在宋家尚谈不上高官显贵，保谦公也很不愿与高官结亲的），便发下了“父母之命”。“程序”健全，不久，两家就在上海为唐星海、温金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对唐星海来说不仅不是一般性的“终身大事”，而且直接关系他一生的事业。

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国内，到他家的“庆丰”一看，远远地便有些失望：平淡无奇的外观总体设计，埋在群居中浑如一体，毫无爽目之处。第一印象就是：土！

太土！丝毫表现不出庆丰的特色与气度，这怎么行？外部空间环境已然如此，那么内部空间环境呢？唐星海只觉得：乱！太乱！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无意于用心设计，厂房内的设备与附属设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学，因而又显得暗、脏，给人以压抑感。机器虽说是最先进的。可分明是有些陈旧了，而且利用率又很低，保养也极不科学！因此，他头一眼的印象就是：老牛车！再看看管理，愈加不满，由表及里都是一个字：旧！太旧！不仅他那明显衰老的父亲仍是常年的长袍马褂疙瘩帽，一年到头捧着水烟袋，连一些职员、帐房、管事，甚至一些老资格的技术人员也是这青一色的装扮，连他那年纪甚小、读书不少的三弟晔如也是一副“长衫先生”的模样与神气！他的六叔不仅装扮如此，那神态举止更仍活脱脱的是位农村老太爷！俗，太俗！根本没有，也没有人懂得什么“生产技术规划”、“生产工艺管理”，涉及一点现代管理，各级人员均是一问三不知，唯一的“先进”设施是尚未译成汉语的波罗（汽笛）每天叫那么有数的几次，催促工人上班，看到的只是该负起工场、车间全面责任的领班，都似一个个土佬财般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似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无所用心；那些本该对生产进行设备与成品检查，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的宕头、工头们个个似地头监工，只晓得对工人开口骂，动手打，差，太差！土而乱，旧而俗，管理又如此之差，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那“老牛车”也不是新的，好的，而是架陈旧的老牛破车！